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成果之二



志在创新的 学术探索

ZHIZAICHUANGXIN DE
XUESHU TANSUO

胡传志 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恒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志在创新的学术探索/胡传志主编.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

ISBN 978 - 7 - 81141 - 816 - 3

I. ①志… II. ①胡… III. ①古典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9724 号

志在创新的学术探索

胡传志 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 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 - 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00 × 1000 1/16

印 张：23.5

字 数：361 千

书 号：ISBN 978 - 7 - 81141 - 816 - 3

定 价：47.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胡传志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具有与学校一样悠久的历史，早在1926年筹建省立安徽大学时，桐城文人姚永朴即被任命为校长。1928年，省立安徽大学正式成立之时，主持具体校务的是国学大家刘文典先生。此后历经国立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工农大学，直到安徽师范大学，其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薪火相传，从未中断。苏雪林、潘重规、宛敏灏、卫仲璠、祖保泉、刘学锴等一批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此，形成了优良的传统。过去虽然没有“教学团队”之名，却具有“教学团队”之实。进入新时期以来，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立足当代，弘扬传统，始终坚持以传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崇高使命，将科学阐释古代文学优秀遗产、服务社会文化思想建设、培养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传人作为根本任务，以教学为主导，以学术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不断推动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一直是我校的优势学科，2008年，本学科通过教育部的评审，成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国家级教学团队。

相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规模普遍较大。我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成员近些年来稳定在20人左右，目前的负责人是首届国家教学名师余恕诚先生。余先生德艺双馨，广受学生深切爱戴，先后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余先生在教学中注重阐释中国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将古代文学教学与人文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并致力于团队建设，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成员中，有全国优秀教师潘啸龙教授，有安徽省教学名师陈文忠、刘运好教授，有皖江学者丁放、胡传志教授，还有众多中青年才俊。在余恕诚、潘啸龙等先生的带领下，本学科逐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富有活力、后劲

充足的教学科研队伍，并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科研促教学的建设思路。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都化为教学资源，如众所周知的李商隐研究成果已写进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并设为专章，其他许多成果都及时渗透到本科基础课和选修课的教学中。

近几年来，我们除了继续坚持科学研究之外，还特意从两个方面加强教学团队的建设。一是加强教学研究。团队成员在日常教学中不断进行教学探讨和教学改革，有的成员将一些思考和实践写成论文，更多的思考是贯穿于教学实践之中。教学改革的成果于2010年荣获安徽省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是注重将教学研究、科学研究落实在本科教学之中，注重培养本科生古代文学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引导本科生撰写论文，让他们掌握基本的论文写作方法、学术规范。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这两方面已经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

这次结集出版的三本书，是本团队建设的阶段性成果。第一本《追求知音的教学境界》，以余恕诚先生的一篇教学论文题目为名，收录两部分内容：一是教学团队成员所写的教学论文和教学心得，多数已经公开发表；二是有关余恕诚先生师德师风、教学艺术的文章，包括媒体上刊发的报导，以及一些学生回忆、总结余恕诚先生教学等方面的文章，这些学生本科时代都听过余先生的课，可以说是余恕诚先生教学的知音。这是首次相对集中地总结余先生高尚的师德、高超的教学艺术，相信这些文章会有裨于他人。第二本《志在创新的学术探索》，是团队成员的科研论文集，收录2008年以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科学研究是我们的优势，2008年以来，我们共发表200余篇论文，其中有许多高层次的论文，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两个刊物即发表18篇论文，因考虑到与另两本成果集篇幅不至于过于悬殊之故，每人仅收入一篇论文。此前，我们曾编辑出版《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余恕诚、潘啸龙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九华集》（胡传志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两本论文集，可以视该书为这两本书的续集。第三本《充满生机的沃土新芽》，收录近年来本科生所写的论文，有的已经发表。本科生发表的论文和作品，应该还有一些，我们难以搜罗完备。有些同学的作业和小论文，亦常有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另外汇集成册。本科生的文章尽管有些稚嫩，甚或有些错误，但每篇论文都或多或少有些新意，体现了青年学生非常可贵的创

新能力，所以愿意奉献给广大读者。

我多年追随在余恕诚先生左右，耳濡目染，受益良多。承余恕诚先生厚爱和信任，我较多地参与组织教学团队的建设活动，这次与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俞晓红教授一起策划、编纂教学团队成果集，得到余先生的亲切指导和其他同仁的大力支持。编成之后，又得到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得到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真挚的感谢。

目 录

序/胡传志	1
走出接受史的困境	
——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陈文忠	1
杨简《诗经》研究的心学特色/叶文举	26
《高唐赋》与先秦的“山水审美”/潘啸龙	39
古代史传“虚构”说辨正/王 轶	50
陆机研究三题/刘运好	64
西域歌舞戏东渐与北齐戏剧之蜕变/李建栋	76
“序”体溯源及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吴振华	92
李白《静夜思》版本嬗变及其诗学思想阐释/袁 茹	113
唐中宗与初唐宫廷诗的新变/鲁华峰	127
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余恕诚	144
白话与性情	
——从元白诗派、性灵派至新文学革命白话诗歌之走向/郭自虎	165
词娱情而婉丽	
——从中国古代娱情文学观说起/杨柏岭	187
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与宋代的词学观念/叶帮义	204
伪齐文学论/邹春秀	218
论杨万里接送金使诗/胡传志	229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解读/李 平	243
论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的编选评点及其词学意义	
/丁 放 甘 松	252
《长生殿》主题商兑/王 昊	269

王士禛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潘务正	283
《红楼梦》诗社与明清江南闺媛结社小识/俞晓红	300
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武道房	312
从“古文选本”到“国文读本”：桐城文章与文学教育的转型 /吴 微	331
论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的文化成因/江增华	360

走出接受史的困境

——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①

陈文忠

一、“问题是学术的核心”

学术史上的学派大都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自发的研究往往早于自觉的理论。同样，早在“接受美学”产生之前，欧洲文学家就开始了经典作家接受史的研究。据目前所见文献，最早似可以追溯到法国文学史家朗松^②。朗松的《伏尔泰的影响》（1906）、《〈沉思集〉百周年》（1920）以及《文学史与社会学》（1904）、《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1917）诸文，不仅对蒙田、伏尔泰、拉马丁等法国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和影响史作了专题研究，而且对经典作家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文化意义作了精辟阐述。此外，德国文学史家贡多尔夫的《莎士比亚和德意志精神》（1911）、施特里希的《歌德与世界文学》（1946）以及福德的《狄更斯与他的读者》（1955）、普拉维尔的《莫里克及其读者：一部效果史的尝试》等等^③，都被后来的

① “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接受史研究的两个中心。1996年，笔者发表了《古代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一文，对“经典作品”接受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初步看法；本文试图根据近年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一探讨。

② 法国文学研究者郭宏安《朗松：永远的参照》：“朗松的文学史理论包含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的萌芽，例如……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研究……今日倡导和研究接受美学的人们在追溯接受美学的渊源时绝口不提朗松的名字，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情。”（《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言甚是。

③ 参阅H. R. 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冈特·格里姆：《接受学研究概论》（《接受美学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等。

学者视为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先导。

在接受美学传入我国之前，中国学者同样意识到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重要性。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30）一文中认为，系统全面的“作家研究”，应当包含“作家作品的影响”或“作家接受史”的研究。他以“杜甫研究”为例指出：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关于杜甫，至少要有一部杜甫传，一部杜甫的时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响，一部杜甫及其诗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叙事诗等等^①。

这里所谓的“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响，一部杜甫及其诗派”，就属于经典作家接受史的范畴，并从“作品影响史”和“风格影响史”两个方面指出了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具体思路。郑振铎进而认为，中国文学史上“至少还有百个以上大作家”需要做这样“特殊的研究”^②。钱锺书《谈艺录》（1948）中的“陶渊明诗显晦”和“宋人论韩昌黎”，可以说各是一部微型的“宋前陶渊明接受史”和“宋代韩愈接受史”，而且对当代陶诗和韩诗接受史产生了多方面的启示和影响^③。闻一多著名的《贾岛》（1941）一文，不仅勾勒了晚唐五代至宋元明清“贾岛接受史”的线索，而且揭示了各个时代“贾岛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④。

不过，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经典作家接受史的自觉和兴起，都是接受美学和“读者文学史”正式提出以后的事。就中国而言，最早的一部中国古代作家接受史，当数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斯卡·李的博士论文《韦应物诗歌的接受批评：一个诗人声誉的建立》。此后，

①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②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③ 以陶诗接受史为例，如钟涛：《从陶诗显晦看中国古代诗歌审美观念之走向》（1991）、萧庆伟：《北宋党争与杜诗陶诗之显晦》（1996），论题直接受到钱文的启发；卢佑诚：《钱锺书的陶渊明接受史研究》（2003），从接受史角度重新阐释了钱文的现代学术意义；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2006），则可视作钱文的现代扩展版。

④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1993),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外国经典作家接受史专著,台湾杨文雄教授的《李白诗歌接受史》(2000),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古代作家接受史专著。迄今20多年来,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受到新一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出版了一批接受史专著,广泛涉及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苏轼、辛弃疾等古典作家;有的古典作家还出版了多部“断代接受史”。

学术专著的出现意味着学术领域的初步形成,学术方法的独立才标志着学术形态的最终成熟。那么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是否已具有一套符合学术理想的方法途径?当前所见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

一种可称为“三维历时结构”,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即属此类。笔者曾把经典作品接受史区分为三个层面,即“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①。杨著即以此为“取资学习的立足点”^②,除“绪论”外,全书由三大部分构成,即“李白效果史研究”、“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阐释史研究”、“李白影响史研究”,每一部分又按时间顺序评述普通读者、诗评家和作家对李白诗歌的接受状况。属于这一模式还有刘学锴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2004)和朱丽霞的《辛弃疾清代接受史》(2005)等。

一种可称为“一维历时结构”,即对作家接受史不细分为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和经典阅读史,完全按时间顺序综合性地评述作家在历代的接受状况。这一思路较为普遍,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1993)、蔡振念的《杜诗唐宋接受史》(2002)、刘中文的《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2006)和米彦青的《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2007)等均属此类。台湾中山大学蔡振念教授对他的“研究方法”作了这样说明:“本文之所以对杜诗在唐宋的接受不细分为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主要是因为杜诗在唐宋的接受事实往往三者互为作用、交叉渗透。”^③

① 陈文忠:《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② 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页。

③ 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0页。

蔡著除“绪论”性的第一章，全书分为“唐人对杜诗在接受”和“宋人对杜诗在接受”两大部分，依次评述了大历诗人、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和李商隐及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江西派二陈和陆游与文天祥对杜诗在接受情况。

一种可称为“多维历时结构”，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当属此类。李著在“绪论”中提出了“两条横线和五条纵线”的思路：“一部陶渊明接受史在共时态上要把握陶渊明为人和诗文两条横线……在历时形态上则要把握五条纵线：重点读者史、声名传播史、创作影响史、阐释评价史、视野史。”^①而全书框架仍按时间顺序综合性地依次评述了陶渊明在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两宋的接受状况，“两横五纵”的思路则隐而未见。这种思路在理念上似对“三维历时结构”的申发，而在操作上则与“一维历时结构”相类。论者提出的应当顾及古代作家“为人和为文”对后世的双重影响，则非深有心得者不能言。

从上述三种研究模式看，目前的“作家接受史”，要么直接借用“经典作品接受史”的研究思路，要么按时间顺序综合性地评述历代接受者对经典作家的评点诠释。前者虽然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但并未抓住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独特问题，因而难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经典作家在历史上的接受特点和文化意义，也难以提出和解决属于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后者则往往流于“历代评论资料”的“排比和梳理”，所谓“研究”基本上只是对某一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的“解释和串讲”，只见“接受者”不见“接受对象”，更未能从接受史深入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史，经典作家的艺术生命和文化影响淹没在历代接受者毫无目标的众声喧哗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已成为最缺乏创意和新意的“学术避难所”。导致这种令人沮丧的结果，实质上与不少研究者缺乏接受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合理方法密切相关。

那么，与经典作品接受史相比，经典作家接受史究竟有无属于自身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方法？如果有，其问题和方法何在？关键还在于对接受史的性质和意义要有深入全面的认识。

①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0页。

纯粹的自然生命只有“生前史”，创造性的精神生命既有“生前史”，也有“身后史”。如果说“创作史”是作家的“生前史”，那么“接受史”则是作家精神生命的“身后史”。作家的生前史与身后史是一种辩证关系：没有生前史就不会有身后史，没有身后史同样也不会有生前史；生前史是身后史的基础，身后史则是生前史的升华和延续；身后史的长度既能见出生前史的厚度，身后史的长度也能反观生前史的深度。因此，接受史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生前史和身后史是精神生命的两端，创作史和接受史则是文学史的两翼。

从学理上说，接受史就是“对话史”，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对话史”，而不是接受者单方面的“独白史”。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实质上是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多元审美对话史和多重意义生成史；它通过多元对话的历时性考察，揭示经典作家在接受史上的生存特点、生命境遇、艺术影响以及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深远意义。据此，从接受过程中独特的关注焦点、接受方式和功能效应看，经典作家接受史不妨“一分为五”，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即经典地位的确立史，经典序列的形成史，艺术风格的阐释史，艺术典范的影响史，以及人格精神的传播史。由此，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创作到审美、从诗品到人品，通过对经典作家的经典地位、经典序列、艺术风格、典范影响和人格精神的传播等方面的多元历史考察，为读者展示出一部立体的、全方位的、血肉丰满的作家身后史。

围绕授受双方的“对话—交往”的历史进程，经典作家接受史不同于经典作品接受史，至少承担五大任务：通过经典地位确立史和“光荣周期”的考察，揭示作家艺术声誉的形成变迁以及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过经典序列形成史的考察，揭示经典作品的遴选过程和作品传播的时空广度和心灵深度；通过艺术风格阐释史的考察，揭示历代接受者对作家艺术个性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和多元一致的特点；通过艺术典范影响史的考察，深入认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和对文学变革的推动作用；通过作家人格形象影响史的考察，深入认识作家在民族精神发展史和民族性格塑造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经典作家接受史也由此可以真正成为—种具有独特对象、独特问题、独特方法和独特研究成果的独立的学术模式，既丰富和充实了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助于从—

个独特角度深入认识经典作家的历史命运、历史贡献和走向现代的精神价值。如果说经典作品接受史着眼于单一文本接受史的研究,那么经典作家接受史则着眼于创作主体接受史的全面考察。

二、经典地位的确立史

只有真正的经典作家才可能进入接受史的视野。作为接受史研究对象的经典作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艺术成就具有经典的品质,二是在接受史上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

“什么是经典作家?”一位真正的经典作家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简言之,一位真正的经典作家无不具有精神的原创性、心灵的崇高性、艺术形式的完美性和语言风格的典范性;这样的经典作家,既是一位独创性的作家,又是一位集大成的作家,他以其卓越的才能、广阔的视野和崇高的境界,创造一种美的秩序,实现一种美的平衡,提供一种美的典范。^①具有经典性是成为经典作家的前提,一个作家只有在长久的时期里博得人们普遍的赞赏,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典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经典作家都有一个给予“长久不断的赞赏”的接受群体,都经历过一个经典化的过程,都有一部独特的经典化的历史。因此,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考察经典地位的确立和经典化的进程。

从经典化进程的一般特点看,经典地位确立的研究有三大主要问题:即经典确立之前的接受境遇、经典确立之时的多重因素和经典确立之后的历史命运。

(一) 经典确立之前的接受境遇

从接受史看,或“一鸣惊人”,或“落地无声”,这是作家经典地位确立之前最常见的两种接受境遇。前者要么是民族文学史上的“第

^① 关于“文学经典”的古典论述,可参阅朗加纳斯《论崇高》、布瓦洛《朗加纳斯〈论崇高〉读后感》、歌德《文学上的暴力主义》、圣·佩韦《什么是古典作家》、艾略特《什么是经典作品》,以及刘勰《文心雕龙》之《宗经》、《辨骚》等论述;现代论述可参阅阎景娟《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论著。

一批天才”，要么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天才”；而大多数作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往往落地无声，久遭冷遇，逐渐发现，方成经典。从关汉卿到汤显祖、从蒲松龄到曹雪芹，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曲家和小说家，从默默无闻到声名显赫，无不经历了漫长的接受过程。

对经典地位确立之前接受境遇的考察，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从接受对象看，扫除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相。今人看古人犹如下级看上级，对象往往被经典的光环和历史的迷雾笼罩，评价者难免一开始就“以鉴赏为瞻仰”，先入为主而缺乏平和的心态和客观的眼光。事实上，无论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与对象越接近，看得越真切，评价也越客观。因此，考察经典化之前的接受境遇，了解同时代人的评价态度，有助于还原经典作家的历史真相，有助于今人以历史的眼光全面观察经典作家走向经典化的曲折历程，同时也有助于对经典作家的经典地位和经典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从接受主体看，透过当时接受者和接受群体的评价态度，了解同时代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可以在比较中发现经典化前后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的变化。例如，为什么同代人眼中的平凡之作或不合潮流之作竟会被后人奉为经典之作？为什么当时对作家的一片贬斥之声会变成后人的一片赞美之语？如此等等，这是极为有趣也是极为有价值的趣味史和观念史的问题。

（二）经典确立之时的多重标志

苏轼《答谢民师书》曰：“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经过或轰轰烈烈或默默无闻的历史淘洗和审美选择，是真金美玉，必然“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卓然独立而成为经典。关于华兹华斯经典地位的确立，德·昆西在1835年有一段经典论述：“1820年之前，华兹华斯的名字给人家踩在脚下；1820到1830年，这个名字是个战斗的名字；1830到1835年，这已是个胜利的名字了。”^①这段话概括了华兹华斯生前接受史的“三部曲”，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也正确立于1830到1835年之间。

经典地位的正式确立，是经典确立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宇文所安指出：“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

^① 转引自黄杲炘：《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①由此可见，经典地位的确立绝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它至少有三重标志，即确立时间、认同主体和确立原由。换言之，研究经典地位的确立，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即何时确立？何人确立？何以确立？

何时确立？即经典地位确立的具体时间和年代。这是经典作家接受史的开端，也是其在文坛和社会产生艺术影响和文化影响的开端，所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古今作家经典确立的时间有一定的差异。一般地说，近现代作家经典地位确立的时间较为具体，古代作家经典地位确立的时间大多比较模糊，这与批评史的发展和接受文本保留状况密切相关。其二，作家声誉的传播不等于经典地位的确立。有的作家生前产生过“轰动效应”，然而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长久不断的赞赏”，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②。

何人确立？即确立经典地位的接受者或接受群体。作家的经典地位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在“大多数人的长久不断的赞赏”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由众多读者构成的接受群体中，不同眼光、不同境界、不同地位的接受者对经典确认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不同的。一般地说，权威批评家的一致性评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柯尔律治、德·昆西和安诺德之于华兹华斯，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之于屈原，颜延之、萧统和苏轼之于陶渊明等，无不如此。

何以确立？即作家经典地位确立的缘由和标准。简言之，必须阐明作家经典性之所在，揭示作家真正的原创性、独特性和对文学史的贡献之所在，否则就不可能赢得“大多数人长久不断的赞赏”，更不可能成为“衣被后人”的经典作家。经典原由的揭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经典地位的确立无不以经典性的学理性认定为前提。因此只有对作家的认识不再停留于诗性的赞叹，而是由审美感性上升为学术理性，做出精当的理论阐释，其经典地位才可能真正确立。如杜甫的经典地位不是确立于任华的《杂言寄杜拾遗》或韩愈的《调张籍》，而是元稹提出著名的“李杜优劣论”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

①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②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页。

序》。其次，对作家经典性的揭示和认同不可能一锤定音、异口同声，而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深化、起伏变化的复杂过程。这与作家创作身份的多样性与经典内涵的复杂性密切相关。苏东坡作为散文家、诗人和词人的经典地位，就是在不同时间逐步得到确认的。

（三）经典确立之后的历史命运

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作家接受史的真正开始，确立之后的历史命运，便成为接受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一般地说，作家经典地位确立之后，大都会经历一个由“光荣的周期”到“恒久的典范”的过程。首先会进入一个议论纷纷、跌宕起伏的“光荣的周期”；然后喧哗的众声渐趋一致，逐渐成为一个“恒久的典范”。

经典作家接受史上的“光荣的周期”，是法国诗人和批评家瓦莱里论述雨果接受史时提出的著名命题。瓦莱里写道：

如果一位作家去世半个世纪后还在引起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对他的未来放心。他的名字几百年后仍将充满活力。在未来的岁月里，抛弃和喜爱的阶段，受推崇和遭冷遇的时候会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对于一种光荣而言，这是其长久稳定的一个条件。光荣成为周期性的了。^①

确实，一位作家经典地位确立之后的最初阶段，其经典的光荣和声誉并不会一成不变始终称好，相反“在未来的岁月里，抛弃和喜爱的阶段，受推崇和遭冷遇的时候会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光荣和声誉会成为一种时起时伏的周期性的现象。无论法国还是中国，作家经典地位确立之后，确实都随之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光荣的周期”；这既与接受者的审美观念有关，也与作家自身特点有关，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家自身创作和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纯粹的光明中和纯粹的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在肯定与否定、抛弃与喜爱、推崇与冷落的对立评价中，经典的品质反而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刻。经典作家一旦穿越了“质疑的风暴”，反对者的一切努力只能巩固其经典地位，并将舆论引

^① 瓦莱里：《文艺杂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向他，喧哗的众声渐趋一致，时间终于使其成为地位稳固的“恒久的典范”。

经历“光荣的周期”而成为“恒久的典范”，并不意味着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就此终结。“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在“说不尽”的接受史上，不同的接受主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看法和立场并不会简单一致，常常会貌合神离，甚至所说非所是。具体地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从接受主体看，不同的接受者对经典作家作一致称颂时，经常会出现“判断相同，判断的理由不同”的现象，所谓“貌同心不同”。自本·琼生以后，几乎所有英国人都“同意”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作家，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历来认为莎士比亚“伟大的理由”因时而异，也因人而异。同样，元稹、苏轼和秦观对杜甫的称颂，与白居易、张戒和沈德潜对杜甫的称颂，理由也不尽相同。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接受者的趣味不同，也可能是对象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研究者必须进行仔细辨析。从接受对象看，接受者对经典品质的评价，可能“判断歪曲了对象，而歪曲的判断往往流露了真实的心态”^①。刘勰与钟嵘对陶渊明的判断就是如此。由于“歪曲了对象”，这种判断可能无助于经典特性的认识；然而流露的“真实的心态”可能折射出群体的、社会的和时代的观念，有助于趣味史、观念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三、经典序列的形成史

经典作品是经典作家的标志，作家经典地位的确立正是以作品的经典性程度和影响力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经典地位的确立史也是其作品经典序列的形成史，二者相互依存，密切相连。不过，作品一经发表就不再属于作家，更不受作家控制，作品具有独立生命和独特境遇。因此，作品经典序列的形成史有其不同于作家经典地位确立史的特殊规律。

作品的经典序列不是一座静止的山峰，而是一条流动的河。在经典序列的形成过程中，经典序列的双重选择和选择重心的多样变化，

^① 参阅迈克尔·泰纳：《时间的检验》，《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07页。